

修辞风格研究

XIUCI FENGGE YANJIU

郑远汉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修 辞 风 格 研 究

郑远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辞风格研究/郑远汉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ISBN 7 - 100 - 04201 - 1

I. 修… II. 郑… III. ①修辞学—文集 ②风格学—文集 IV. H0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437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XIŪCÍ FÉNGGÉ YÁNJIŪ

修 辞 风 格 研 究

郑远汉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 - 100 - 04201 - 1/H · 1043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5/8

定价:21.00 元

序　　言

中国修辞学会原副会长、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郑远汉教授是我们的老师。重读先生的论著，感触良多，总想说点儿什么。

先生在大学执教近 50 年，倾力于汉语教学与研究，退休以后仍然勤耕不辍，现已出版学术著作 10 多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万字，内容广涉古今汉语研究的很多方面。综观之，先生的研究以现代汉语为主，但在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研究方面也不乏成果，先后在《中国语文》、《古汉语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几点质疑——古汉语语法教学系统的讨论》（1996 年）、《近代汉语结果式“得”字句》（1997 年）等论文；先生主要以修辞学、风格学的突出建树而闻名，但在语法学、词汇学、辞书学、话语学等方面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发表了《记言式及其结构分析》（1983 年）、《句子的研究问题》（1994 年）、《略谈单句复句的划界》（1979 年）、《重复式合成谓语》（1980 年）、《数量词复叠》（2002 年）、《论词内反义对立》（1997 年）、《论字典的特殊性和独立地位》（1986 年）、《字词释义的两个原则》（1990 年）、《谈同训》（1980 年）、《语言词与话语词》（2001 年）、《问对结构》（2003 年）等重要论文。其研究范围之广泛、学术眼光之深邃、理论方法之先进、学术成果之丰实，令学生们倾倒。先生的学术实践，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经常教导我们的：学业要专，但面不能窄，因为知识是相通的。专和博，必须相辅而行。

本书所选录的只是先生在修辞学、风格学方面的部分论文。

这也正是先生用力最勤、建树最多、最为学界所称道的领域。所以这里着重就先生在修辞学、风格学方面的学术思想和所作的贡献，谈谈我们的认识。

一 不断拓新的学科思想

郑远汉先生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开始，就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修辞学、风格学研究之中。他不仅关注修辞学、风格学的具体问题，更注重从学科出发进行大的理论思考，并且与几位著名学者共同发起，于 1980 年在武汉成立了“中国修辞学会”，被推举为副会长（张志公先生被推举为会长）。20 多年来与修辞学界同仁一道，为修辞学和风格学学科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孜孜以求，作出了重要贡献。

修辞学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可以说，中国现代修辞学就是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不断的探索争鸣中逐步发展起来的。70 年代末至今，修辞学界开展了几次大讨论，郑先生都站在前列，对修辞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观点，格外引人注目。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郑先生率先发表了《关于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的长篇论文，和王希杰等先生一起，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大讨论。郑先生认为，一门学科要发展，要深入，首先要弄清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修辞学研究要冲破以辞格为中心的樊篱，研究各种言语形式及其同义现象。这一思想，在当时对修辞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在随之而来的关于同义结构的学术讨论中，郑先生又率先发表了《略论同义结构》的论文。对于同义结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

法,有人认为修辞学研究的惟一对象就是同义结构,有人认为同义结构不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郑先生认为,修辞学要研究同义结构但不能说修辞学只研究同义结构。郑先生在对同义结构的研究中,提出了“同义结构群”、“同义结构肢”、“同义结构的排头结构”等概念,富有创见性。此后,又发表了《试论修辞范畴》,出版了《语言“选美”》(笔名“武延”),将“同义选择”的修辞学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和深入化了。

80年代中期的语体学讨论,把我国修辞学研究推向高潮。郑先生参与了这场讨论,发表了《语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在这篇论文中,郑先生对语体、文体、风格几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进行了科学的界说,采用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对谈话语体、艺术语体、科学语体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90年代,为进一步推动修辞学的深入发展,郑先生针对修辞研究中出现的新情况,又陆续发表了《修辞学面临的矛盾和我们的任务》、《漫谈修辞研究的兴衰与前景》等论文,表达了他的新的修辞学思想。

可以看出,郑远汉先生在历次修辞学学术争鸣中,都以敏锐深邃的学术洞察力,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发表了富有创见性和指导性的观点,展现了他不断开拓创新的修辞学思想,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创新与发展的一些方面,发挥了先导的作用。

二 别具一格的修辞学体系

郑远汉先生不断提出修辞学系统的构想,并为此作了具体深

4 修辞风格研究

人的探索。如同义手段的修辞系统(见《论同义形式选择》、《试论修辞范畴》、《形式和意义的矛盾》等论文),规范性修辞和变异性修辞系统、语言因素与非语言因素的修辞系统(见《规范性修辞与语言规范化》、《语言的临时因素与非语言因素的修辞作用》、《规范·风格·变异》、《句子的研究问题》、《语序与修辞》等论文)。

更值得一提的是,郑先生于1979年出版的《现代汉语修辞知识》(湖北人民出版社),创建了以语言因素和超语言因素为纲的修辞学新体系。此前,以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为代表的修辞学体系论述的重点主要是修辞格,即以辞格为中心。而郑先生认为,修辞既然是语言运用问题,就应当重视语言因素,要从语言因素入手,不能停留在一些特殊修辞现象即辞格这个层面上。《现代汉语修辞知识》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撰写的。虽然在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里已有关于修辞同语言因素之间关系的论述,但是该书的重心和基本体系仍没有脱离辞格中心论。因此,从体系性、全面性看,郑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知识》确实是“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修辞的路子”。对此,宗廷虎先生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中有这样的评述:

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论“语音现象和表达手段”时,分“叠音”、“拟声”、“谐音”、“双声叠韵”、“字调”、“押韵”、“儿化韵”等七个角度论述。郑著第一章论“语音表达手段”则把它们归并成三节,即“声、韵、调的配合”(论双声、叠韵、协韵、平仄等)、“音节、停顿的配合”(论单双音节的配合、叠音、音顿等)、“拟声和谐音”,每一个下面再分问题,科学性较强。张弓论利用词汇因素时,主要只阐述同义词及其运用问题,郑著则除论述利用词语的同义关系外,还论析了利用反义、多义关系和利用词形的分合变化等因素构成

多种修辞问题。张弓论利用语法因素时，主要论述词法同义形式、句法同义形式与修辞手段的关系；郑著论语法表达手段则分别从六个方面阐述。郑著吸收了张著的基本原理，但又不为所囿，而是有新发展，有新创新。……总的来看，该书前半部以语言三要素的表达手段为纲，专从语言三要素的角度谈修辞手法的组成，可说是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修辞的路子。

三 深入细致的辞格研究

郑远汉先生在辞格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辞格辨异》（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书中。这是一部专门运用比较法来研究辞格的著作，其真知灼见，跃然纸上。

全书除“前言”外，主要讲辞格与非辞格的辨异和邻近辞格的辨异，并补充介绍了几个辞格。在辞格与非辞格的辨异中，特别对易于混淆的“像字句”、“变成句”、“省略”、“倒装”、“幽默”、“讽刺”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近邻辞格进行辨异时，主要研究了比喻与比拟，借喻与借代，夸张与比喻，比拟、移就与拟人，拈连、婉转与折绕等的区别。例如在对“像字句”的分析比较中，郑先生指出：“比喻一般要用‘像’、‘好像’等作比喻词，但是用了‘像’、‘好像’等的语句未必是比喻。”它们的相同点：“都用了‘好像’、‘仿佛’等情态副词，表示人的主观感受。”不同点：“非比喻句是直接说明事物的属性，用了‘好像’等表明了事物实际上并没有或者未必表现出该属性，却可以有这样的属性；比喻句从表面看也是直接说事物的某种属性，实际上它不可能具有这种属性，而是用本质不同的另一事物作比。”这种分析具体、深刻，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际指

导作用。

四 富于创见的言语风格学理论

1990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郑远汉先生的《言语风格学》(1998年修订再版),标志着汉语风格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代表了我国目前言语风格研究的学术水平。《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3期编辑部的文章说,“郑远汉的《言语风格学》可以说是一部有一定代表性的语体论著”。

开拓创新是这部书的最大特色。在论述言语风格的性质时,郑先生认为言语风格的性质应该是语言—言语性。分析言语风格,就是要分析它的风格要素和风格表现,而风格要素、风格表现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语言及其成分不同的分布结果,分析言语风格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对语言及其成分的分布情况作出描述。这种分析,既可以从前言、前语作品出发,描述不同言语类型的风格要素和风格表现,又可以从语言及其成分着眼,分析各种语言成分、语言单位的风格性质,从而概括出该语言的功能变体类型。郑先生认为,言语风格的形成是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结合和统一。风格首先可以分为非共体性和共体性两大类,在非共体性范围内,又分言语民族风格、言语时代风格、言语个人风格等,在共体性范畴中,又分语言的功能变体和言语交际风格。这不仅解决了风格的分类问题,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完整的言语风格学体系。郑先生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的基础上,对言语风格的体系性作了恰切的阐述,如“对立和互补”、“聚合和复现”等,阐释精当。在确立言语交际风格时,确立了“变异体”这一新的类型,并从各个方面对其进

行具体论述,说明了“变异体”是一种客观存在。关于语言功能变体(语体)的划分,充分体现了郑先生的独到见解。郑先生划分的科学体、谈话体、艺术体,不仅注意到了语体划分标准的同一性,也注意到了不同语体表达特点的别异性,所以它得到了修辞学界很多学者的赞同。

在对言语风格进行具体分析的过程中,郑先生运用了多种方法。

1. 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如在分析言语个人风格时,采用了这种方法。郑先生认为,老舍和赵树理的个人言语风格不同,从总体上看,老舍的语言大抵可以归于藻丽型,赵树理的语言大抵可以归于平实型。“老舍作品的语言要‘洋’一些,吸收了不少欧美语言的句法、章法,而‘洋’中又有‘土’——大量运用北京方言、土语,乃至一些社会方言;赵树理作品的语言要‘土’一些,更多地体现言语的民族传统、民族风格,却很少用方言、土语,句法也多取正式体。”所选取的言语材料是老舍的《断魂枪》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

2. 比较方法的广泛运用。郑先生在研究言语风格时,自始至终运用了比较的方法,通过不同时代言语作品语言特点的比较,说明言语的时代风格;通过不同民族语言表达特点的比较,说明言语的民族风格;通过不同言语表达者的不同言语表达特点的比较,说明言语的个人风格。例如在说明言语个人风格时,郑先生进行了三组不同情形的比较,一是作家的言语风格比较(老舍和赵树理),二是政治家的言语风格比较(毛泽东和刘少奇),三是作品人物言语的比较(《红楼梦》中的贾政和刘姥姥),每组比较各具特色,十分精彩。

8 修辞风格研究

3. 抽样统计方法的运用。如在论述语体和句式的关系时,郑先生对十九种不同句式在不同语体中的具体表现作了统计说明。在论述老舍和赵树理安排段落的不同特点时,对老舍《断魂枪》和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进行了抽样调查,老舍《断魂枪》约 5400 字,66 段,独句段 39 段,约占总段数的 60%;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约 11000 字,51 段,独句段 6 段,约占总段数的 11%。通过统计说明:老舍作品划段比较自由,人物说话不论长短,通常自成一段,叙事语言的段落比较零碎,不拘语义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赵树理作品划段比较严整,一段有一个中心,内容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这样的结论论据充分,具有说服力。

言语风格研究,充分体现了郑先生严谨、扎实的学风。从汉语的实际出发,深挖汉语的言语风格特质,建构真正的汉语言语风格学体系,这是郑先生研究言语风格的宗旨。既不回避问题,又不妄下结论;既做到了透彻,又毫无“水分”;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用价值;其成果为学术界所瞩目。

以上只是我们的粗略认识,也许未能深入先生的学术精髓,姑妄言之,权充引玉之砖。

冯广艺 冯学锋 赵世举

2004 年 8 月

目 录

关于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	1
修辞学是言语学	14
研究语言不能不研究言语	24
修辞面临的矛盾和我们的任务	38
形式和意义的矛盾——修辞面临的矛盾之一	43
修辞中的十对关系	49
语修结合纵横谈	64
修辞研究的再认识	72
漫谈修辞研究的兴衰与前景	80
试论修辞范畴	91
言语的美	101
语言的临时因素与非语言因素的修辞作用	112
语言的伴随因素与修辞	128
规范性修辞与语言规范化	138
论词内反义对立	144
数量词复叠	155
“著名”、“重要”小议	174
“不在”和“不在了”	180
关于句子的研究问题	183

2 修辞风格研究

句式与语体.....	195
语序与修辞.....	212
结构变换修辞论——定中式和主谓式的换用	226
同指异位句的选用.....	237
记言式及其结构分析.....	242
定语后面“的”字的用和不用问题.....	256
问对结构.....	266
语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82
风格与文体.....	295
规范·风格·变异.....	308
省略句的性质及其规范问题.....	318
言语规范三层次.....	335
关于“网络语言”.....	350
毛泽东政论作品中的句法特点——毛泽东言语个人风格研究	
之一	362
词语反复用法和设问与反问相结合——毛泽东著作语言研究 ...	370
老舍、赵树理言语风格比较	376
“好事成双”的文化心理与汉语的民族风格.....	384
后记.....	389

关于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

语文学界对修辞学的性质、对象和任务，认识不很一致，影响着修辞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亟需注意的问题。

一 认识分歧的由来

从社会上看，对于“修辞”是什么，认识是十分含糊的。有的把修辞与写作等同起来，有的用“语法”代替修辞，有的认为修辞就是使语言用得优美生动。这就产生了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认为学了修辞，就能写好文章；另一种偏向是，认为修辞没有什么用。

社会上的糊涂认识，同修辞学的历史和现状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直接关系。修辞学的历史是悠久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可以说就有了“修辞学”。但是，从伊梭克拉兹（前436年—前338年）的《修辞术》，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的《修辞学》，到欧洲中世纪把“修辞学”列为“七自由学艺”中的一科，虽然其中有一些今天看来是修辞学的内容，但论述简朴、混杂，未能奠定修

* 本文是两年前（1977年）写的，后来听说在有关的教材会议上，相当多的人与我的观点相同和相近，欣慰之余，觉得无发表之必要。最近读到王希杰同志的论文，王文多处提到拙作《现代汉语修辞知识》（原书署名“汉语教研室”），我感到有响应之必要，于是对原文作了一些修改，予以发表。

2 修辞风格研究

辞学基础。另外,如西瑞洛的《雄辩家》,昆特利安的《雄辩术系统》等,如果说这是修辞学,倒不如看成逻辑学。那时人们是把修辞同逻辑、论辩等联系在一起、混杂在一起的。

在我国,修辞研究的历史也是悠久的。如《易经》、《礼记》、《仪礼》一类书中,就有“其旨远,其辞文,其文曲而中”,“情欲信,辞欲巧”,“不辞费”,“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等论述。虽是只言片语,但颇有见地。刘勰的《文心雕龙》系统地总结和提出了许多有关修辞方面的问题,如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等,还把文体风格概括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给后代的修辞学以很大影响。此后在许多诗话、文谈、随笔、杂记中,都有关于修辞方面的论述。但都把修辞同写作、文艺评论联系在一起,混杂在一起,也没有形成独立的修辞学。

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建立了我国的语法学。此后,“文法与作文”、“文法及修辞”一类著作冠以“文法”之名,而主要是谈修辞或写作方面的某些问题。解放以后,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50年),则更为明显地将语法同修辞结合起来(实际上,还包括了词汇和逻辑)。这部著作影响不小,社会上把运用语言的问题同“语法”联系在一起,同这类著作的影响不无关系。

1923年唐钺根据纳氏菲尔德的《英文高级作文法》写的《修辞格》,是我国以讲“修辞格”为中心的最早一部著作。1932年问世的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上海大江书铺),虽然提出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论及的问题比较广泛,然而以“修辞格”写得最详备,对后来的修辞学影响也最大。近些年来出版的修

辞著作，诚如王希杰同志在《修辞的定义及其它》一文（《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所指出的：“从唐钺的《修辞格》到华中师院中文系的《现代汉语修辞知识》，……不少修辞著作中，主要是一些修辞格的介绍分析。”许多人认为修辞学就是研究修辞格，目的是使语言优美生动，这种片面的看法显然同这类著作的影响有关。

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出，对修辞学研究对象和任务的认识，历来就不一致。这种认识的不一致，突出地反映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第一，修辞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第二，辞格论能不能代替修辞学？第三，修辞学的性质、对象和任务到底是什么？这都是些重要的原则问题，如果没有一致的明确的认识，势必影响修辞学科的深入发展。

二 修辞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修辞学属于语言运用的科学。语言运用涉及的面是相当广泛的。现在，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逻辑学等，都有各自的研究对象。修辞学同上述学科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有人说，修辞是一门边缘学科，这种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无道理。

然而同其他许多学科的联系只是修辞学一个方面的特点，不是它的实质。现在有不少语法、逻辑、词汇等著作，不是立足于本门学科的特点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认真地揭示语法规律、逻辑规律和词汇体系等，而是不恰当地理解所谓“联系实际”，跨越到修辞学范围，大谈有关修辞现象，结果是既不能把修辞问题谈清楚（不可能谈清楚），也妨碍了对本门学科的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是当前应该引起重视的一种倾向。

4 修辞风格研究

任何学科都必须联系实际。但是什么是“实际”呢？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实际，应该根据本门学科的性质和任务联系有关的实际；跨越范围地联系“实际”，脱离本门学科的特点，那是“越俎代庖”。例如汉语语音学，应研究汉语的语音系统，如果在语音学著作中，大谈利用声韵调造成各种表达手段，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就越出了语音学的研究范围。汉语词汇学著作，要关心的是汉语的词汇体系、词义系统，至于如何利用词汇体系、词义系统构成种种表达方式，如何根据表达的需要予以恰当的选择和安排，这些问题不应该是词汇学的研究对象。语法学是研究语言结构规律的，而在此基础上构成哪些同义形式，各有什么表达效果，则属于修辞学的范围。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利用某种思维形式，或者故意“违背”某种思维规律造成的修辞现象，也只能是修辞学的对象，而不属于逻辑学的范围。

强调各门学科自身的特点，这有利于各门学科的发展。科学的分工日趋细密，这是一种进步。过去，许多著作谈到了修辞方面的问题，好些问题谈得还相当深刻，由于同其他问题混杂在一起，人们没有从修辞学的角度予以重视，更没有在它们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这里特别要提出来的是清人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全书共分七章，后三章是关于校刊问题，前四章基本上谈的是古汉语修辞。它从语言的角度，总结出了不少古汉语的同义形式和表达方式，别开生面，对于我们今天讨论和建立新的修辞学体系很有参考价值。可是这部书竟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本属于校讎学或训诂学的书。这说明，内容混杂，叫人难识真面目，势必影响学科的深入发展。^①吕、朱二位编的《语法修辞讲话》是从语言的角度讲修辞，但如前述，它是杂糅式的体例，词汇、语法、逻辑、修辞样样有。